

帝国的价值

THE PRICE OF EMPIRE

[美]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 塞思·蒂尔曼 合著



帝国的价值

[美]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

塞思·蒂尔曼 合著

熊昌义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帝 国 的 价 值

熊昌义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875 印张 插页 2 张 117,000 字

1992 年 7 月第一版 1992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553-2/D·286 定价：3.20 元

前 言

如果人们记得我，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我爱唱反调。我对此并不介意，但当重要的问题与你的殷切希望和坚定信念格格不入时，除了唱反调或置之不理外，别无选择。

我的原则并不是唱反调。在我看来，一个参议员有责任独立进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1965年，在我批评约翰逊政府干涉多米尼加引起争议后，我曾在参议院发表一次演说，我力图依据我的理解，确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作用。我说过，主席“有特别的义务就外交政策问题提供他力所能及的最好咨询；我认为，这是主席这个职务本身赋予的义务，它高于对政党的忠诚，它与主席的观点是否符合政府首脑的要求或意愿无关。”

回首往事，我的观点很少符合政府的要求，我猜想，符合其意愿的就更少了。但无论好坏，我还是提出来了。我的意见是否有长远价值或有所贡献，需要等待其他人来判断。回顾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70年代中期担任公职的生涯，我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如，现已进行42年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以联合国的形式复兴国联，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有不少贡献，包括创建肯尼迪中心。但现在回首往事，一切就很

清楚了。我所希望的超出了现实的范围：我为越南战争而感到灰心丧气，为改革分权原则和总统选举程序的想法受到抵制而痛心疾首。就象拉丁美洲早期政治家米兰达毕生为自由和独立奋斗，而一事无成一样。我时时感到，在这些方面，我就象“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

此外，我也有些遗憾，因为权利的是非曲直，使得政治上值得建树的方面很少容易成就。这并不是贬低所有官员都支持和促进的兴修水坝及河流设施、城市复兴计划，以及农业资助计划。我很高兴，我在促进棉花、大豆、大米的种植和加工以及养鸡等方面尽了自己的力量，这些地方行业给我的家乡阿肯色州的人民带来了小小的繁荣。这些国内项目属于或多或少容易成就的范畴。它们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由于这种原因，值得优先发展。但是，它们未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我们国家治理的方式，20世纪后期治理国家的条件和面临的挑战，有关国家的安全、经济、教育和社会正义问题方面的急需，如何象其他人那样观察世界，为了迎接全球挑战而进行的全球合作方面的进程。

这些都可称作“生存”问题，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与那些一成不变的传统的思维模式、有限的境界、垂死的想象、企业的贪婪、政治上的野心以及蛊惑民心的宣传相抵触。在“现实主义”名义的掩盖下，那些取消令国家日益衰弱的军备竞赛的计划，那些对政府体制重新合理的考虑——特别是挑选总统的程序——那些为了实现联合国未兑现的承

诺而采取的实际措施，往往都在冷嘲热讽中告吹。各种帽子满天飞——从“对共产主义手软”到“轻信上当”、“天真”以及“反美”。就连由拉丁文“自由”演变而来的“自由主义者”一词也在最近的竞选中成为一个耻辱的字眼，为两党候选人所摒弃，视其为亵渎家喻户晓的神明，与脍炙人口的古老神话唱反调，破坏大家所熟悉的传统的和平，向过去是但现已不复存在的古老真理挑战。当我想到这些问题时（我尽量让自己别一直想），我就会记起百年战争中欧洲遭到浩劫后一位瑞典伯爵对他儿子讲的话：“请记住，我的孩子，只要玩点小聪明就可以治理世界。”我记起了亚历克西斯·托克奎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评论：“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这样缺少独立思想和真正的自由讨论。”

这是一面之辞，却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假若仅有这一面，我们除了自取灭亡外，就无所事事。但我总觉得还有另外一面，即人性的一面，尽管其脆弱，却把握理智和同情心。大量事实表明，我们很少学习经验，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从不学习经验。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会不时出现一些新的事物——从伯里克利的雅典到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从罗马的持久和平到沃德罗·威尔逊根据我们时代的法律提出的世界和平的著名概念。这都是一些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假若过去证明成功的希望甚微，但不管怎样却存在着另一个决然不同的世界，在希望甚微与毫无希望之间，还存在着希望。

我们事实上处在一个满怀希望的时代，一系列地区性战争，包括阿富汗和伊朗——伊拉克战争，正趋于结束，或暂时搁置起来。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上台，尽管它还未经受考验，但新一代领导人的就任至少会带来新思维方式的希望。也许最有希望的是在俄国和中国出现了一代富有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新领导阶层，这可能会开辟史无前例的合作途径，减少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敌视；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的扩散；改换资源的用途，从而提高我们社会的生活质量；利用更有效的机制和平解决地区性冲突；建立急需的全球体制，保护我们这个十分脆弱、处于极端危险状态的地球环境。

历史的发展对我们并不利。我们美国可能走过去许多大国走过的老路——强权政治以及与其他大国毫无目的的竞争的老路，古代雅典人以及上世纪盛极一时而今早已衰落的欧洲一些帝国的老路——我们曾许下的伟大诺言，即“山巅之城”的诺言已经破灭，最后牺牲于骄横的权力。

但是，没有任何迹象预先注定美国的没落和衰亡。如果注定要来，就一定会来，因为我们自己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因为当所有的理智和常识要求我们以最好的希望和最大的可能行事时，我们却受到古老的神话和恐惧的束缚。最有害的神话就是相信分权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特别是挑选总统的程序。现在的作法削弱了民主政府的力量，破坏了它的信用，降低了国家的地位。

我们的未来不在天上，而在我们心中。富有创造力的领

导和人文教育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人类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第一需要。40年前，我在美国参议院荣幸地发起了国际学术交流计划活动，其目的过去是、现在仍是促进两种以上文化间的交流。这是一个抱着不太谦恭的宗旨的谦恭计划——使一个政权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比过去空洞的权力体制更加文明、更加理智和更加人道的成就。我当初坚信这种可能性。现在仍然坚信。

G0850/27

译者的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始终将苏联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为了遏制苏联的势力和影响，美国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政策，对内加速经济的军事化。从50年代起，美国四处插手，先后染指朝鲜、危地马拉、古巴、越南、格林纳达、中东等，导致东西方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军备竞赛也愈演愈烈。

目前美国虽然仍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但是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从60年代末起，美国开始了逐渐衰落的过程。美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面临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严峻挑战。美元的国际储蓄货币的地位急剧下降，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逐渐趋向崩溃。美国跨国公司的实力与50年代相比大为逊色。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已今非昔比。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已大大下降。美国已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本书作者威廉·富布赖特系美国资深外交家，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在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美国历届政府推行干涉主义外交的内幕。由于作者的资产

阶级价值观，本书对中国、苏联及一些国家的看法时有不实之处，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本书除第二章删去个别重复繁琐之处外，其他章节全文照译。

1991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冷战：美国和苏联	(1)
第二章 美国宪法与政治的困境	(35)
第三章 重温越南悲剧	(69)
第四章 美国的军事化经济	(92)
第五章 干涉问题	(110)
第六章 中东问题	(130)
第七章 象其他人那样观察世界	(141)
后记：论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168)
附：作者简介	(178)

第一章 冷战：美国和苏联

在里根——戈尔巴乔夫第四次首脑会谈之后，当我们继续设计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可行政策时，我毫不怀疑，我们的政策只是部分地建立在一些特别问题的事实和价值的基础之上，如中东问题、军备竞赛和人权问题。我们的决策至少——或怀疑更多——是根据我们与俄国人继续相互作用的态度来设计的。假若一方象以前一样确信另一方的真正目的是控制或消灭对方，那就不会有全面的军备控制协议，因为差不多所有的武器系统都具备潜在的侵略性；也不会有争取中东和平的合作，因为施加任何影响都会当作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也不会有持续贸易，因为几乎任何商品，就连食品也会加强一个国家的作战能力；可以肯定，人权问题的长期改善就更谈不上，因为按苏联的观点，放松控制就会打开西方颠覆的大门。

令我奇怪和困惑不解的是，我们总是缠着俄国人不放。以前，我认为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原故。但现在我不那样看了。我认为我们对中国人的不喜欢和怀疑从未象对俄国人的那样深。事实上，当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

象我们一样恐惧和敌视苏联人时，虽然中国是共产主义，我们很快就将它象事实上的战略盟友一样拥抱。南斯拉夫人也是共产党，我们与他们相处得很好，即使与罗马尼亚人，我们也是够友好的。现在我明白，是俄国人使我们不安，吸引着我们。俄国人有些事挂在我们心上——他们的国土规模，他们的实力，他们作为全球竞争对手的可靠凭证，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是相象的。这种相象激怒了我们，冒犯了我们。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主要国家，陷入竞争是十分自然的。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以来大国走过的道路。这是国与国之间古老的游戏——确切说来，是一种残酷的、致命的游戏——但无论如何也是一场游戏。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战争已成为国王们的游戏。但是核武器，就连常规武器的威力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我们在核时代正在玩一场新的游戏——失去理智、惨无人道、自取灭亡的游戏——一场没有任何胜利者的游戏，一场我们只有拒绝才可避免输掉的游戏。

我们深深感到，看上去，有时也这样说，我们应该是头号，确切来说，应该承认我们是比苏联更强大的国家。追溯其源，就象橄榄球场上谁是头号选手那样明显。我们将全球政治变成了一场超级橄榄球大赛，就象内布拉斯加州与俄克拉何马州以及华盛顿的雷德斯金队和丹佛的布朗柯斯队相互争夺冠军一样。对于内布拉斯加州与俄克拉何马州以及华盛顿的雷德斯金队与丹佛的布朗柯斯队来说，这是大事，它们的竞争不伤害任何人，给人以娱乐。即使当年法国和德国争

夺欧洲霸权地位，也未给人类带来损害。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这种游戏就再也不是儿戏了。

我发现，将我们与苏联人的竞争描绘成一场“游戏”——一种没有道德内容或价值的竞争，会使许多人反感，还会引起某种程度的误解。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意识形态问题象超级大国争夺中的战略和经济赌注一样实在和重要。但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很清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是一些基本问题。小动作是历史的永恒。小动作并不是仅限于大国的竞争，它是某种要素，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时代，看来它总是存在，尽管不被察觉，但却永远存在。

我们被告知说，俄国人只尊重实力。我不明白“只尊重实力”这句话是什么含义。我或我们大家都不赞成单方面解除武装。这是不成问题的。以超过任何人（包括俄国人）的庞大毁灭力量追求头号地位与谋求平等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以核武器去追求这种地位尤其是这样。在这儿，有些表达上的困难，但我认为，制造更庞大、更精良核武器的军备竞赛并没有增强我们的安全。相反，直到1988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才认识到，军备竞赛，尤其是每一项新武器技术的发展，只会削弱我们的安全。

俄国人的威胁确实存在，但我们手中有核武器，我们对全球政治的整个思维方式都应该改变。1945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大突破。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这个世界强权和文化的中心变成一片废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大伤元

气，在当时看来，很难重振雄风。苏联损失惨重，有200多万人丧生。中国也同样蒙受日本入侵和内战的灾难；德国和日本的大城市化为灰烬。这一切早在原子弹投到日本两座城市之前就发生了。核武器的出现最清楚地表明——假若以前不太清楚——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不理智的自杀行为，因此为老百姓所不能容忍。

面对这种潜在的巨大危险，历史提供了一些和平与世界秩序的模式，或者说是一些确保人类生存的已经试验过的体制的模式。爱因斯坦在1945年说过：“现在，除我们的思维方式外，一切都已改变。我们正在向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漂流。如果人类要生存，我们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掌握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还在固执己见，拒绝面临我们形势的最基本的事实。拒绝我们和俄国人还在继续以陈腐的国家私利以及自我扩张为动机这一事实。听一听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外交演讲，你就会体会到，他们的头脑中除了这些前提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每一方都声称——真诚地自信——自己以崇高的信念为动机。有些听众为那些动人的演讲所打动，比讲演者还要激动。但是雄辩并不等于真理。我们大多数人都与自己的价值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坚信自己高尚的道德。但是，当我们注意外交政策时，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以其全部诚意所表现的和思想和冲动，很少提及他们的真正政策，多数情况下是将水搅浑。我们通常将自己强烈的竞争性和私利理想化。

只要我们不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很少有机会面对人类许多共同的问题。我们美国人尤其倾向于道德上的说教，自认为公正善良。我们经常强调自己动机的善意和纯洁性，很容易断定那些怀疑这些动机者为邪恶之徒。吉米·卡特的口头禅“象其人民一样善良的政府”与里根的“邪恶帝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一块铜板的正反两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四、五十年来对共产主义的责难毫无实质内容。至少直到最近，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实践有许多方面都是残忍、专横的。斯大林尤其专横，照米诺万·德吉拉斯的说法，是一个“要毁灭十分之九的人类、为十分之一的人类造福”的反常的暴君。苏联在世界许多地区的行为——尤其是东欧——同样残暴，尽管近年来有所减弱。但苏联制度与苏联外交的许多方面是反对暴行的，并不是什么“当代世界邪恶的中心”，更谈不上是全球庞大阴谋的策源地。

过去，我往往觉得很难将个人的道德标准用在国家的行为上，现在仍然这样看。国家的道德与我们所期待的个人道德是不同的，也没有必要将两者划等号，尽管从历史记载来看美国要比其他国家好一些，但我们与他人相比，一般来说也没有什么两样。象珍妮·柯克帕特里克那样的冷战辩护士拼命鼓吹我们的道德标准大大高于他人，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坚定信念。但是，这类伪装的虔诚总使我想到这样一些概念：损人利己、自我欺骗、沙文主义。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着崇高的目的，而俄国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称霸全球的卑劣伎俩，我对这种观点十分反感。我想起1965年对多米尼

加进行干涉时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的一场交锋。我认为我们的军事干涉与俄国人在东欧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我的一位共和党同事对我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我追问他区别何在，他最后说：“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他们好。”自从我开始政治生涯起，我就接触到这类事，在我看来，我们的这种优越感往往是对别人的蔑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很了不起——但我从未感到美国人在道德方面比别人优越。事实真相是，当你以我们自行鼓吹的观点去观察我们的行为时，就很难区分我们在越南与苏联在阿富汗的行为之间的差别。

尽管存在周期性的解冻、军备协议和迈向缓和的步伐，但我认为，下述观点在大多数美国人中颇有市场：俄国人无论怎样说都是十足的疯子，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言，与他们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们、主宰世界。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说法。在我们的观念中有一种心理上的隔阂。好象他们就不是人类的一员。我们无须对这种观念加以验证，但我们确实很少将他们看作人类值得尊敬的一员。我怀疑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对此一定十分讨厌。这种观念既不存在于我们正常的、日常的接触之中，也不存在于我们正式的外交往来中，却存在于我们的原则态度之中，即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为着邪恶的目的。这种看法也代表了他们的形象。

尊敬的精神病学家埃里奇·弗洛姆1956年写道：

对外国缺乏客观态度，其声名狼藉。别国成天腐